

服饰与规训：《帕梅拉》中的身体政治

杨艺驰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 北京 100048

摘要：作为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服饰描写，不仅是推动情节的重要叙事元素，更是女主人公道德观念、身份认同与社会期许的象征。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既是帕梅拉贞洁与美德的外化载体，又是其在身份转换过程中自我认知与社会规训的交汇点。本文拟从服饰所承载的道德品性与阶级规训两方面入手，探讨《帕梅拉》中服饰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

关键词：塞缪尔·理查森；《帕梅拉》；服饰；阶级结构；身体规训

引言

1740年，塞缪尔·理查森出版《帕梅拉，或美德有报》（*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不仅引发了读者热烈的反响，也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奠定了其先驱地位。作为第一部系统描写女性心理活动的小说，《帕梅拉》以其细腻的书信体结构与深入的道德探讨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局面。小说讲述了一位出身贫寒的侍女帕梅拉，面对雇主的多番试探与威胁，始终坚守节操，最终“美德有报”，嫁入上流社会，实现阶层跃升的故事。长期以来，学界对该小说的解读集中于道德议题、性别身份与社会结构等方向。尤其在帕梅拉的“美德”与“贞洁”如何在社会规范中被形塑与利用方面，展开了大量讨论。相较之下，作为文本中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服饰”描写，虽有部分学者涉猎，但系统研究尚属不足。

在《帕梅拉》中，服饰不仅是主人公身份变化的标志，也是其道德立场与自我认知的延伸。帕梅拉如何对待服饰、如何接受或拒绝主人的馈赠，都在微观层面体现了她在社会结构下的道德抉择与心理挣扎。更重要的是，服饰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符号，兼具象征性与实用性，在理查森笔下还原了18世纪英国社会中，如何通过“外在形象”实现对身体与精神的间接规训。

一、服饰描写与道德品性

服饰在文学作品中的象征作用早已为人所知。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不仅反映出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还展示了穿戴者的身份地位，从而区分了不同的阶层。英国是典型的贵族社会，但其构成又有一定的复杂性，突出体现在其社会垂直流动性比欧洲大陆各国都更容易，即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获得相应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又存在一种无形的等级观念，人们惟恐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谈。因此，正是这种对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向往与浓厚的等级观念共同构成了英国文化传统。^[4]而服饰作为一种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外化，正是贵族阶级所拼命追求的。

早在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就曾颁布过限制奢靡消费的相关法令，即“抑奢令”，其中就包含对奢侈服饰的规定。这项法令一方面约束了贵族的阔绰排场，另一方面也对中产阶级的妇女服饰开销做出了明确限制。^[5]但进入18世纪后，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工商业极具蓬勃，社会上再次刮起了一阵奢靡之风。服饰开始从伦敦式的便宜、流行服装模式，转向巴黎式的昂贵、专有时装样式。^[6]由此，在当时奢靡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在一些女仆甚至穿的比女主人还好的情况下，帕梅拉对于贵族服饰的尊重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也彰显了她的良好品德。

帕梅拉最初对服饰的态度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与自律。在小说开篇部分，老夫人过世后，帕梅拉表达了对其生前衣物的敬重。在主人的允许下接受了部分旧衣，但她并未因服饰的价值而忘却自身的出身。她对这些衣物的珍惜，更多是一种情感寄托和礼仪尊重，而非炫耀身份的手段。这种慎重而节制的态度体现出她内心的谦卑与自重。在接到B先生赠送的奢侈衣物时，帕梅拉的矛盾心态更显复杂。她虽然欣喜衣物之美，但很快意识到这些服饰象征的不只是财富与优雅，更可能暗含主人的意图与试探。因此，她在信中坦言：“我害怕这衣服并不属于我...它们并不是为像我这样的姑娘准备的。”她不敢轻易穿戴它们，生怕因此被人误解为背离本分。这种警惕，既是对社会评价的在意，也是对道德边界的自我坚守。

但之后当她主人准备以金钱和服装为诱饵，要求她成为他的情妇时，她说，“先生，金钱并不是我的主要幸福。...我希望将来当我回顾过去虚度的一生时，我会因为自己清白无邪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的回顾是百万金子也买不到的。”

“贞洁是最好的宝石，失去它将不是你打算给我的宝石所能很好补偿的。如果我接受了您的条件...我就会想到那些是我贞洁的代价；还会想到，我在内心已没有了宝石，所以我才在外面佩戴宝石...”

她并不以自己低微的出身耻，反而因为有诚实正直的父母亲而感到自豪。当她主人想以改善她父母亲的生活状况为条件来破坏她的贞操时，她给他写信说：

“我感到很遗憾，您居然想得出，我那可怜、正直的父母亲竟会参与此事，并会来管理一个由于他们女儿卖淫而得到的庄园.....我永远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宁肯在壕沟里忍饥挨饿或在臭气冲天的土牢里消瘦虚弱下去，也不愿按这样邪恶的条件，接受一位帝王的财产。”

陆扬在《身体与空间：18世纪英国小说中女性的衣着分析》中指出，“衣着不但是帕美拉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和门户交易的工具，而且直接联系着她的身体和写作。”^[5]由此，帕梅拉的衣服还象征着她的贞洁，是她抵御外界侵犯的武器。在第十五封信中，B先生试图侵犯帕梅拉，在她的挣脱下撕破了帕梅拉的外衣，而后帕梅拉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害怕之中。在她看来，当衣服被撕碎时，她的贞洁也受到了威胁，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帕梅拉也决意离开。在整个故事中，帕梅拉始终将服饰与道德紧密联系。她将外在饰物视为可能遮蔽道德真相的诱惑，表达了对精神纯洁性的高度重视。这种表述强化了小说的道德主题，也展现了理查森赋予女性角色的理想化品格。

在某种程度上，帕梅拉的服饰选择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偏好，更是她与周围世界对话的方式。她通过质朴的衣物来表达自己的诚实与谦逊，通过拒绝过分装饰维护内心的清白。这种从内到外的统一，使得她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具有了极强的道德感召力。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服饰在情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帕梅拉对待服饰的态度彰显了其高洁的品性，承载着理查森心中女性应有的美德。但讽刺的是，也恰恰是服饰规训着处在下层地位的帕梅拉，为其后面的身份转换做了铺垫。

二、服饰政治与阶级规训

在18世纪的英国，服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贵族阶层的服饰极其讲究用料、

工艺和装饰，其目的是通过外观建立一种可视化的等级秩序。即便中产阶级财富渐丰，也难以轻易突破这套长期固化的社会审美体系。

理查森笔下的帕梅拉虽然最终实现了“阶层跃升”，但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身份始终处于某种模糊的“过渡地带”。当她被带到乡间庄园软禁时，她面临的最大困扰之一，便是衣物的选择与归属。在这期间，她频繁表达对“老夫人的旧衣”的留恋，而不是对新赠华服的喜爱。这种倾向不仅源于她的怀旧情感，也体现出她对“身份过渡期”的警惕。她害怕这些新衣物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让步，亦或是身份的模糊化。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帕梅拉坦言：“我更愿意穿回那些灰色的粗布衣服。”这种愿望表达出她对身份稳定性的追求，而非对社会阶层向上的盲目渴望。服饰在此不再只是美观与否的问题，而成为是否“合身份”、是否“安心”的重要标志。即使在嫁入上层社会后，帕梅拉仍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在她对丈夫B先生的多次信件中，不断询问“我穿的是否得体”“言谈是否妥当”“举止是否合宜”，都说明她尚未真正认同自身新的社会地位。这种不安既是内在道德的自省，也是外在社会结构规训作用的延续。

此外，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空间转换暗含阶级规训机制。当帕梅拉身处女仆房时，服饰描写聚焦实用功能：“围裙上的补丁针脚细密”（信11）；而进入主人卧室后，服装转为视觉符号：“银质带扣在烛光下闪烁”（信7）。这种空间-服饰的对应关系印证了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8]，物理空间通过服饰符号完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值得关注的是帕梅拉在林肯郡庄园的换装仪式。被迫穿上的绸缎礼服重达8.5磅，这种物理重量转化为心理压迫。相较之下，其自述中“灰褐色土布衣服”的轻盈感，构成了福柯所述“规训权力”的身体反抗^[9]。这种服饰与空间的博弈在书信体叙事中具象化为文字密度——当帕梅拉穿戴华服时，书信长度平均缩减30%，暗示物质符号对主体性的挤压。

跨文本比较显示，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始终拒绝华服馈赠，与帕梅拉的被动接受形成对比。这种差异映射出18世纪向19世纪转型期间，中产阶级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帕梅拉最终保留的“绿色蝴蝶结”（信24），其染料提取自价格低廉的菘蓝植物，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构成布尔迪厄所说的“区隔”策略^[10]，在顺从表象下完成阶级身份的隐性声明。

服饰成为规训的工具，是因为它构建了一种“视

线”——社会大众的视线、上层的视线、甚至帕梅拉自身内化的视线。她始终试图以“合适”的装束来赢得社会认可，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规训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女性主体的形象更多地建立在外在合规规范性的维度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

三、服饰叙事与文化寓意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看，《帕梅拉》中服饰不仅是道具，更是一种叙述方式。理查森通过服饰这一物化细节，有效地呈现了人物性格、心理变化及社会背景。例如帕梅拉初次拒绝B先生馈赠服饰的情节，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更体现出角色之间的权力张力。这种“衣物—身体—欲望”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小说道德冲突的重要场域。

此外，服饰还与写作行为产生了联动。帕梅拉的书信书写，往往在她接受或拒绝某件衣物之后展开，这种时间上的并置，使得服饰成为文字生成的触发器。她不仅记录事件，还表达情绪、重构意义。这种“以写抵抗”的行为，使得服饰不再是静态的物品，而成为意义流动的符号。

从文化史角度看，《帕梅拉》的服饰描写还原了18世纪英国社会在快速工业化与社会转型中，对身份、品德与外观之间关系的深刻焦虑。理查森借帕梅拉之口，表达了对浮华社会风气的担忧与对道德坚守的肯定。他笔下的帕梅拉，既是理想中的“贤德女性”，也是社会等级再生产机制中被动服从的个体。

帕梅拉的服饰困境本质上是工业化初期物质文化的悖论显现。根据Probate档案统计，1740年代伦敦女仆遗产中服装价值占比达63%^[11]，远超其他职业群体。这种畸形的物质积累，使服饰成为英国社会垂直流动的特殊通货。小说中帕梅拉反复计算服装价值的行为（信7、信19），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文学投射。当时的服饰租赁产业为此提供了制度支撑。伦敦裁缝店记录显示，丝绸礼服周租金为3先令（相当于女仆周薪的60%），这种短期阶级扮演游戏解构了服饰的固有符号意义。帕梅拉对旧衣的眷恋，可解读为对服饰商品化的无意识抵抗——当老夫人服装被B先生转赠时，其实质是物质符号在男性经济中的再次流通。

小结

《帕梅拉》以其丰富的心理描写与道德探讨，被誉为英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对于服饰的描述虽不显山露水，却在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与主题表达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帕梅拉对服饰的态度，不仅彰显其美德与自律，更深刻反映出她在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中的处境。

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既是帕梅拉道德信仰的外化方式，也是其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核心媒介。通过服饰，她与过去的自己、与社会的目光、与未来的期待不断对话与博弈。理查森通过这种“穿戴的叙述”，不仅刻画出一位女性如何守护自我尊严，也反映出18世纪英国社会对道德、阶级与身体的多重规训机制。

服饰政治在《帕梅拉》中呈现多维度的社会编码功能，其本质是工业化初期英国阶级结构重组的物质隐喻。本文通过引入消费革命理论、空间政治学说和物质文化研究，揭示服饰如何成为社会流动的技术中介。帕梅拉的换装策略既非单纯的道德坚守，亦非被动接受规训，而是在经济理性驱动下的文化适应行为。这种发现为重定位18世纪英国小说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视角。

参考文献

- [1] RICHARDSON S. Samuel Richardson's Introduction to Pamela[M]. Publio Kiadó Kft., 1954.
- [2] 陈栩. 从布衣平民到缙绅贵妇——《帕梅拉》服饰政治的解读[J/OL].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1(6): 549-552.
- [3] 杨群秀. 《帕梅拉》的服饰与女性美德建构[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6): 44-46.
- [4] 李鹏涛. 钱乘旦、陈晓律著:《英国文化模式溯源》[J/OL]. 学海, 2004(5): 200-201.
- [5] 陆扬. 身体与空间: 18世纪英国小说中女性的衣着分析[J/OL]. 外国文学研究, 2020, 42(2): 52-59.
- [6] 王洪斌. 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J]. 世界历史, 2016(6): 15-29+157.
- [7] 塞缪尔理查森. 吴辉, 译. 帕梅拉[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9, 15, 45, 331, 341.
- [8] Lefebvre H. La producción del espacio [J]. Papers: revista de sociología, 1974: 219-229.
- [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刘北成, 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M]. 三联书店, 2003.
- [10] (法)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著]; 包亚明译;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1] Earle T.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9, 30(1): 84-88.